

# 潇湘的衰变与晚清湖南形象的转型

张弛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晚清时期的湖南形象, 在各类历史与文学文本中, 经历了一个从危机到转型的过程。古代寓湘者笔下被高度审美化的潇湘形象, 逐渐走向衰落和变异, 在异域文明的冲击之下, 湖南成为传教士等外来者眼中最为保守的中国区域。作为回应, 郭嵩焘、曾国藩等湘军创建者, 开始从缥缈隐逸的潇湘风景中走出, 寻找个人与国家的出路, 他们与更多本土绅民一起, 呈现出湖南人物闭塞保守却又进取开新的立体形象。戊戌时期湖南的维新运动虽然失败, 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士人, 却从荒蛮偏僻的潇湘地理和文化现实中, 发掘了湖南少历史负累而具独立根性的“士节”“民气”。20世纪初, 杨度、杨毓麟等湖南留日学生,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晚清湖南形象的想象和重塑。

**关键词:** 潇湘; 湖南形象; 传教士; 湘军; 维新运动

**中图分类号:** I218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1)04-0203-12



晚清时期, 湖南形象作为中国区域形象的代表, 被不断呈现于各类文学和历史、虚构和非虚构的文本当中。这与湖南自身在近代中国异军突起的事实, 形成了一种文化想象与历史现实的关联互动。而在相关研究视域中, 晚清湖南虽不同于以北京为代表的帝国权力中枢、以上海为代表的殖民通商口岸等地缘符号, 却同样被当作自成一体的节点被叙述和讨论<sup>①</sup>。这些研究当中包含了对于湖湘文化、湖南人精神本身的个性化建构努力, 但又处处显示出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中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相互对立”且“不断变化”<sup>[1](5-6)</sup>的共性形象特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 晚清湖南并非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化地理版图的中心, 也不是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却在封闭与开放、保守与激进、守旧与变革的辩证冲突中, 持续调适着自我在现代世界文明谱系中的形象定位。这一转变过程的重要表征, 便是古典文化谱系中具有审美诗意的古潇湘形象, 在晚清时期经历的衰落和变

异, 以及湖南这一现实地理概念与其背后隐含的文化信息和理想, 在中外作者写实或虚构的文字中被不断强化。需要指出的是, 类似于葛兆光在思想史研究中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 承载这一时期湖南形象书写的, 不仅有传统精英士大夫所撰写的史传和诗文, 也包括普通旅行者的日记与游记、民间报刊上的评论与通讯、市井间巷流行的通俗小说等。这些多元的作者、媒介和文本, 共同参与了晚清湖南形象的转型与建构。本文期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打通文史边界, 梳理不同群体、文本对于晚清湖南形象的书写和想象, 并探究其与现实社会变迁的关系。

## 一、从审美到现实: 湖南形象的危机

在作为地理概念的湖南进入晚清公共文化视野之前, 潇湘一直是这一区域形象最主要的文

收稿日期: 2020-04-21; 修回日期: 2020-07-3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近代湖南形象的历史书写与文学想象”(17K060)

作者简介: 张弛, 湖南岳阳人, 文学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晚清民国文学与文化, 联系邮箱: zhangchi307@126.com

化符号。从《尚书》和《竹书纪年》中关于舜帝南巡和二妃传说的记载,到《山海经》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sup>[2](176)</sup>的传说,潇湘一词早早进入人们的视线,并逐渐从单纯作为潇水、湘江交汇区域的合称,演变为洞庭以南、五岭以北整个湖南地区的泛指。在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记载游览今湖南区域的《楚游日记》中,就有“初涉潇湘”<sup>[3](226)</sup>的说法。湖南作为行政命名在唐代业已出现,唐广德二年,于衡州设置“湖南观察使”,行政区划上第一次出现了湖南一名,并在元明清时期作为地理行政区划,长期隶属于湖广行省。但显然,《山海经》《楚辞》《史记》等历史文学典籍里就开始被记录和建构的潇湘图景和意象群,在有关对湖南形象的接受、认知和阐释中,拥有着更为宽广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米芾在《潇湘八景并序》中曾说:

潇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而南,皆二水所经。至湘阴始与沅水会,又至洞庭与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潇湘名。……潇湘之景,可得闻乎?洞庭南来,浩渺沉碧,叠嶂层岩,绵衍千里。际以天宇之虚碧,杂以烟霞之吞吐。<sup>[4](2)</sup>

米芾认为,“湖之南皆可以潇湘名”。从他的描述可以看出,以潇湘为代表的湖南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被高度审美化、诗意化了。作为蛮荒边地,湖南远离中原地区,山川河流阻隔,是大批文人士大夫的流放贬谪之地。但从屈原、贾谊开始,潇湘二字背后的旖旎山水和灵秀风物,为现实政治中失意的人们,提供了一处安放人生和心灵的精神家园。特别是唐宋之际,大量的文士被贬至此,“处江湖之远”竟促成了流寓文学的空前发达。潇湘在他们笔下,是杜荀鹤“残腊泛舟何处好,最多吟兴是潇湘”的随性洒脱,也是陆放翁“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灵动诗意;是刘禹锡逐客楚地时“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的怀古自怜,也是秦观被贬谪湘南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幽远寂寥<sup>②</sup>。直到清代,《红楼梦》中作为林黛玉遗世独立、高贵执着性格象征的居

所,被曹雪芹命名为“潇湘馆”,更是蕴含了地理环境与小说人物形象交融的文化信息。此时的湖南,处于这些迁客骚人的想象之中,自然状态下的调适和谐,对于寰宇时空的浪漫想象,消解了他们与现实社会的紧张关系,也让“潇湘”成为以中原文化、儒家正统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明的一种补充,丰富了现实之外极具美学色彩的古典中国形象。

鸦片战争以降,国家民族的现实失败带来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以及新的世界知识和文明意识的冲击,极大地影响了外来者对于中国地理和风景的感知,更使得中国各区域的文化形象在中国知识群体内部遭遇了空前的危机。而此时的湖南,已在康熙三年(1664)从湖广行省中分离出来,在行政划分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作为清帝国十八个省份之一,以“湖南”之名,重新被外界认知和书写。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潇湘这一文化符号在晚清湖南形象的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衰落和变异。当以西方传教士为代表的外来者初临湖湘大地,就不再是以诗化的、审美的目光来寻求自然风景的慰藉,而是一种世俗、理性的观察和写实,看到的是作为晚清时期中国形象重要组成部分的湖南。有美国“汉学之父”之称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其初版于1847年的汉学经典《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湖南这一内陆省份。他显然注意到了“潇湘”在中国文学中的特殊性,并在书中提到“湖南有着很高的文学地位”<sup>③</sup>。但纵观全书,这位美国传教士更倾向于以一种疏远的、非亲和化的目光,来考究湖南的风土人情、物产地理,并将之与中国其他沿海省份相比较。在谈论潇湘一词原指的潇水、湘江的交汇区域——湖南西南部的永州地区时,卫三畏声称,那里的原住民部落是无法驾驭的,“本省南部永州和贵阳之间有面积很大的高地,居住着瑶人,山岭上隘口设了路障,违反他们的意愿是不可能攀登上去的”<sup>[5](148)</sup>。

与古代遭遇谪贬、流放至湖南的文人士大夫群体相比,卫三畏的观察代表了一种新的外来群体视角。他们将西方近代的文化价值观延伸至对

中国的区域观察，并通过该区域形成有关中国社会的集体想象物。而他们对于湖南的兴趣，正与晚清湖南自身的对外封闭有关。祝家宁(Charles H. Judd)、花国香(G. W. Clarke)、陶鄂(A. C. Dorward)等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从光绪元年(1875)开始就尝试进入湖南，但其布道和游历的过程无不举步维艰，甚至不断有关于湖南地方发生的排洋暴动消息传出。缥缈、模糊的审美形象表述，对于这些西方外来者而言没有太多意义，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作为现实社会区域的湖南。即使到了19世纪末，在国内天主教主办的中文刊物《益闻录》上，虽然依然在使用“潇湘”一词来指代湖南，却早已褪去了审美化、诗意化的特质。在这组《潇湘风雨》《潇湘间气》《潇湘竹粉》《潇湘脆竹》等以“潇湘”为题的文章中，内容多为“湖南巡抚陈中丞到省以来，事事整顿”“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一带茶市商人购者甚多”“近准开行小轮”“今界禾苗颇劣”等诸如此类的现实话题，全然不见古“潇湘”形象原有的神韵和气象。

于是，当殖民势力和洋务运动在中国沿海城市不断留下近代化印记、外来旅行者笔下亦出现对于北京与浙江等地风光的艳羡和赞美时，原本以风景闻名的湖南形象却遭遇了巨大的危机，成为西方人眼中最难以进入的“壁垒”，甚至是“敌方”。在湖南建立湘雅医学院的传教士胡美(Edward H. Hume)形容其为“封闭的拱门”<sup>[6](12)</sup>。虽然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巡抚陈宝箴大力推动湖南的开放与变革，但是绅士与民间的排外风气及由此树立的形象，却很难在一朝一夕被改变。1897年，在西方传教士内部流传甚广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曾专门刊文《湖南局势》(“The Situation in Hunan”)。作者在文中刊印了完整的湖南地图，并流露出对于湘江流域自然地理的赞许，但在湘潭及长沙等地遭遇的艰难时刻、当地民众表现出的不友好姿态和拒斥心理，还是让他感叹这是“一个小的独立王国”<sup>[7](255)</sup>。1898年，负责修筑粤汉铁路的美国工程师伯生士(Wm. Barclay Parsons)在游记《西山落日》(*An American Engineer in China*)中，用了全书最大的篇幅书写了一章“湖南：中国最封闭的省

份”，并以长沙城市和城墙为现实意象，描绘了晚清湖南急剧衰落的对外形象：

湖南省的长沙因其极端的排外而成为整个清帝国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之一。迄今为止仅有2—3个外国人而并没有传教士进得了长沙城。……如同整个所有的城池，长沙城有高大的城墙，有坚固的城门。这些城门晚上都紧紧地关闭着，透露出一种极其原始守旧的气息。<sup>[8](48)</sup>

当原始守旧的湖南形象被放大为整个清帝国的象征，成为中西文化形象比较中中国“失败”“落后”的隐喻时，也让中国本乡本土的士人群体愈来愈感受到传统“潇湘”在近代时空中的衰变。谭嗣同少年游历之时尚有心情写下“袅袅箫声袅袅风，潇湘水绿楚天空。向人指点山深处，家在兰烟竹雨中”<sup>[9](73)</sup>这样吟咏“潇湘”晚景的诗句。其后他在与友人书信中谈及“湖南之阻矿物，阻电线。以天子之尊，不能举一事；官湖南者动色相戒，噤口不敢谈洋务”，且注意到西方人“其评吾湘人，一则曰‘无教化之野蛮’，再则曰‘未开智识之童驂’”<sup>[9](205-206)</sup>。现实中民众与官员的颀顽愚昧固然让谭嗣同忧愤，而域外视野中被贬斥的湖南形象则更加让他感到焦虑。正是在这种现实焦虑的影响下，晚清时期在人生逆旅途中来湘的人士，已再难获得古“潇湘”世界里的幽远清静。晚年林则徐在谪戍后返乡，途经湘江，只留下信中几句“舟行甚滞”“水枯石逆”<sup>[10](428)</sup>的病中感慨，难觅自己早年间游访三湘胜迹、作诗唱和的心境；青年时代的秋瑾随父客居湖南，在闺中写下“百结愁肠郁不开，此生惆怅异乡来”<sup>[11](92)</sup>，则处处显出对于此地保守闭塞风气的不满。不管是老病孤舟的林则徐，还是青春作赋的秋瑾，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他们的视线从审美的“潇湘”转向现实的“湖南”，无不起因于愈演愈烈的国家民族危机。

“潇湘”作为区域文化形象符号所经历的衰落和变异，可以看作是古典中国形象进入近代时空的缩影，而有关“湖南”形象的评判和讨论，则成为观察和思索中国彼时现实积弊的窗口。1897年，黄遵宪受命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后代理湖南按察使，参与了湖南新政期间长沙保卫

局、时务学堂、南学会的创办。在他赴长沙前曾途经岳州，登临岳阳楼并有诗记之，眼前有作为“潇湘八景”之一的浩瀚洞庭，还有“红髯碧眼”构成的现实景观，“巍峨雄关据上游，重湖八百望中收。当心忽压秦头日，画地难分禹迹州。从古荆蛮原小丑，即今砥柱孰中流。红髯碧眼知何意，挈镜来登最上头”<sup>[12](764-765)</sup>。黄遵宪的诗在近代寓湘文人中颇具代表性：在咄咄逼人的欧风美雨面前，湖光山色映照下的潇湘美景有些黯然失色，与昭示着现代性来临的火车、轮船以及纷至沓来的西方人物相比，客观的山水景物正逐步退出清末知识阶层的视野。在这种视角转变的背后，也蕴含着他对于湖南从古代“荆蛮之地”到如今“砥柱中流”的期许。关于湖南形象的聚焦重心，也随着区域历史进程的发展，逐步发生了位移。

## 二、从景物到人物：湖南形象的过渡

尽管出现在外国旅行者笔下的潇湘景物不少已逐渐成为帝国保守闭塞的象征，但从晚清湖南走出去的人物却多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无论是洋务运动中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还是维新运动中的谭嗣同、唐才常、杨度，大量开明人物的涌现，促进了外部对于湖南形象的关注。原本在审美化的古“潇湘”形象中，三湘四水的风光景物是其中心，古代诗文有关“潇湘”的浪漫书写，往往与古典美学“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观念相契合。景物是人物情感与观念的外化，人物形象则常常隐匿于自然山水当中，与潇湘风景及其蕴含的人文气象交融。即使在唐宋时期描写潇湘人物的《柳毅传》《谭意歌传》等传奇作品中，作者也更注重以洞庭、岳麓、桃源、衡山等自然景观来造境，烘托缥缈幽远、隐逸闲适的潇湘意象。因此，自古湖南形象的营造与传播，并不倚重人物，这一方面与地处中原文化外围的楚地旖旎风物、巫风民俗有关，另一方面也因湖南地处偏僻、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较小，湘人较少参与到中原地区主流的历史进程

当中。

关于湖南人物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地位和形象，皮锡瑞在《师伏堂日记》里曾谈道：“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蛻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sup>[13](105)</sup>根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的统计，清朝科举考试各省录取数目，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之”<sup>[14](76)</sup>。湖南受此影响，在科举制度下的地位并不高。台湾学者张朋园亦指出，“湖南文风并非鼎盛，接受完整儒家教育的，不过1%~2%，绝大多数的民众均为文盲”。因此全国进士中额，湖南一度在全国18个省份中位列第14位，“文风显然并不突出”<sup>[15](72)</sup>。这样的情形自然也引起湖南本土人士的不满，作为湘军的创建者之一，郭嵩焘曾经在同治元年(1862)的日记中写下几首竹枝词，并附有评论，其中第四首为：

捶鼓家家起荷戈，大风吹蹙洞庭波。由来楚境横天下，千里潇湘地几多。

言天下无人，无有能鼓舞人才者也。楚境一隅，经营天下，可以鉴焉。<sup>[16](12)</sup>

郭嵩焘此番议论中，“潇湘地多”与“天下无人”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照，暗指面对危局，理应有湖南人出来挺膺负责。他的姻亲、湘军领袖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中，也有意撇开对于湖南地理环境的赞美，而强调湖南人物的历史传承和责任意识。在曾国藩看来，“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而屈原、周子“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sup>[17](2)</sup>。正是在这种本土意识的鼓舞之下，二人联手创办的湘军名噪一时，而包括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在内的湘军将领，作为“中兴名臣”开始引领全国之风气，并为外人所瞩目。出身合肥名门的李瀚章和扬州望族的卞宝第，先后在各自的湖南巡抚任上主持编修《湖南通志》，召集曾国荃、李元度等湖南地方精英参与编撰。湖广总督满人裕禄亲自为《湖南通志》作序，序言中特意凸显了不再隐匿

于潇湘风景而在国运衰危时挺膺负责、重拾经世学问的湖南士绅，称：“若夫湘之贤士大夫砥砺名行，敦厚风俗，用以踵乡先哲之遗烈，栋家干国，无负颂臣中丞编撰之盛心，则禄区区之意所重有望于湘人士也夫。”<sup>[18](2)</sup>

在这一由景物向人物形象的过渡中，潇湘大地的山川风物不再作为聚焦中心，而是被内化为湖南人格魅力的象征。英国传教士林辅华(Allan Charles Wilfrid)在他作于1870年的《我们进入湖南》(*Our Entry Into Hunan*)一书中，把这种湖南杰出人物在晚清时期出现的井喷现象，以及这一群体坚强、独立又好战、骄傲的个性，归结于一种“自然的力量”(natural energy)。不过他所指的这种自然力量，并不源自让人静穆隐逸的传统“潇湘”景物。在这名英国传教士看来，湘军的兴起以及晚清湖南人尚武任侠的习气，与曾国藩所谓的“荒僻恶劣”的地理环境有关，他在书中不无夸张地宣称：

自然的力量导致他们放弃了更和平的生活追求，也正因为此，中国帝国中的大部分军队是湖南人。许多政府部门也由他们控制，他们的人格力量使得他们成为了国家天然的领导者。<sup>[19](17-18)</sup>

以地方乡绅创办的湘军及王闿运极具文学色彩的史传《湘军志》为代表，形成了晚清湖南“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人才形象景观。戊戌时期梁启超在《南学会序》中因此称赞湖南“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藪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sup>[20](66)</sup>。从潇湘风景、绅士宗族中走出的杰出人物，被外部猎奇和赞许的目光所捕获，相对于遥远闭塞的楚地神秘风光，这些人物更为直接地构成了现实的湖南形象。美国学者裴士锋曾经谈到清朝实施的回避本籍的任官政策，使得晚清“湖南人的崛起，意味着该省最有才华的人不能服务乡梓”<sup>[21](31)</sup>，这也形成了一部分晚清湖南形象的代表人物在本土遭受非议、在异乡反遇知己的奇特现象。江西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湘中与人交游，将郭嵩焘形容为王船山之后湘学的代表，称“船山遗书‘久而后显，越二百有余岁，

乡人湘阴郭侍郎嵩焘，始尊信而笃好之，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sup>[22](768)</sup>；谭嗣同自幼在外游历，广交天下，其“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sup>[23](106)</sup>的湘人形象最终由粤人知己梁启超书就。在众多晚清小说创作中，不断出现虚构的湖南绅士身影，其形象基础恰恰来自现实中在各地出仕游历的湖湘人物。例如刘鹗在《老残游记》第二回济南明湖局听书一段中，塑造的操着湖南口音、对白妞说书做出精彩品评的“梦湘先生”，就是以随祖辈到山东任官的湖南籍诗人王以愨为原型，“梦湘”二字透露出时代变幻中对于古典潇湘精神衰落的哀婉，其墓志铭“潇湘之西，洞庭之侧，孕精育灵，终返其宅”<sup>④</sup>，更是道出了近代湖湘人物从旧时潇湘风景走出去的过程中，对于旧时潇湘风景与文化语境的回望和感怀。

但在此时，湖南及湖南人物形象还是存在着两极化的现象：率先从潇湘走出去的湖湘子弟，构成了晚清湖南人物群像开放、进取、敢为天下先的一面；而基数更为庞大、留在本土的湖湘绅士阶层和普通民众，则构成了为外来者所谈论的保守、封闭的一面。原本为外人所称道的晚清湖南风云际会、人才辈出，更多源自少数开明绅士阶层，许多外来者也将湖南地方的改良期望寄托于本地绅士的进步。直到19世纪末，梁启超还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提出欲兴民权、开民智，必先兴绅权、开绅智，“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情之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sup>[24](44)</sup>。伯生士在游记《西山落日》中，也曾从生活层面，将湖南地区的居民分为两类：一类与沿海开放区域人民的生活已无太大差异，能够了解到外部世界的信息，甚至拥有自己的报刊与电报；另一类则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极为匮乏，缺少教育和宗教，“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为维持最低程度的生存而挣扎”<sup>[8](64)</sup>。但如果从思想层面而论，这两类人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质上都被归为一类——保守封闭的晚清湖南人代表。不仅在外来者看来如此，在另一部分离开湖南、外出游历生活的湖南人眼中亦是如此。

少数有幸走出本土的湖南人，得以漫游城市

空间或出使欧美世界,在体验现代性的同时,也给湖南形象带来了比较视野。当他们返归桑梓之地时,眼前的潇湘不再是浪漫的抒情景致,而是从异域到原乡、从外部风景到本土现实的巨大反差,以及反差之下显得迂腐冥顽的乡绅父老。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赴伦敦担任驻英使节,在欧洲游历期间不忘在日记中赞叹欧罗巴风景,感慨“泰西所见,大都闳丽新奇,穷极精巧,惟罗马一皆古迹,游观竟日,别具一番心眼,此行良不可少也”<sup>[25](764)</sup>。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黯然回乡时,却再也无暇顾及千里潇湘的自然风物,转而聚焦于为轮船机器所震惊、拒洋人于城门之外的本地绅士。郭嵩焘本人也因为“去父母之邦”“沟通洋人”遭到了污蔑和攻讦,他在日记中颇为气愤地写道:

据各省咨报,洋人请领护照至湖南者,层见叠出。盖拒之愈力,则其意相尝试,伺隙以求逞者亦愈烦。吾楚士绅用其昏顽之气,聚众狂呼,以为洋人可以慑而伏之,多见其不知量也。<sup>[25](845)</sup>

在外人看来,“湖南向称守旧,故凡洋人往游历者动见杀害,而全省电信轮船皆不能设行”<sup>[23](130)</sup>。在此之前,曾国藩病逝于南京,用以装运灵柩的外国轮船行至长沙,就曾遭到乡绅官吏的集体抵制。而作为本土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遭遇则更成为湖南这种现实社会形象的典型。回避本籍的政策,让郭嵩焘、曾国藩这类精英的人生努力,与湖南本土渐渐疏离,也难以对数额庞大的湖南绅民形成实质性影响;而源自潇湘“自然的力量”又使本土湖南人骁勇善战且性情激烈,以至于对外来新鲜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敌对和排斥。包括湘军对于太平天国战争,也被顺理成章地阐述为对儒家正统地位的捍卫,并进一步演化为全体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很多进入湖南的西方人,都会提到宁乡人周汉的名字,他撰写的反洋教图书诸如著名的《鬼叫该死》,就将湖南的排外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林辅华在《我们进入湖南》一书中不仅把周汉称之为“这场反对洋教与外国人的运动的精神领袖”<sup>[19](28)</sup>,还特别提到周汉曾经投身左宗棠领导的湘军,并最终与其产生分歧的经历。对于他们而言,这意

味着在近代湖南人当中,开始出现趋时更新和守成保守两类立场鲜明的群体。直到戊戌时期,在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与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派之间的冲突中,依然可以看出这样的分野。这些人物的长时期对立共存,进一步凸显了矛盾又立体的晚清湖南形象。

### 三、从守旧到开新:湖南形象的重塑

实质上,无论是古代处于中原文化外围的“潇湘”,还是近代远离沿海开放区域的“湖南”,都隐含由地理位置造成的陌生荒蛮之感。谭其骧在《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中曾指出:“在楚南之今湖南地,几不为中国人所知。《尚书》中有所谓‘崇山’,有所谓‘苍梧’,其地皆在今湖南境,然当时中国人对于此诸地之知识,其模糊隐约盖与秦汉人之视蓬莱方丈等耳。”<sup>[26](56)</sup>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地理环境,成就了文人士大夫笔下幽远缥缈的“潇湘”意象,也逐渐形成了古代湖南独立于华夏主流以外的“他者”形象系统。无论是外来者,还是本土人士,往往会默认并接受湖南的偏僻、闭塞,进而忽略湖南与现实历史的交集。在他们眼中,湖南偏远封闭,恰恰满足了自我对于隐逸避世理想的追求,因而他们笔下的“潇湘”既是抒情的、审美的、自然的,也是静态的、抽象的、非历史化的。例如:明代传奇《龙会兰池录》写北宋灭国,男女主人公逃避兵燹之灾,来到南方一处名为“潇湘镇”的地方,在“携手向南行,看一枝好处”的《潇湘梦》词中自觅佳境、疏远时局;而作为湘学先贤的王夫之,明亡之际归隐衡阳,避世独居、著书求索的同时作《潇湘怨词》,也唯有“九嶷修眉,烟秋不展。望里盈千,目飞无寄”<sup>[27](8)</sup>;甚至于郭嵩焘晚年落寞孤独,不断遭到贬斥和攻击,招饮中尚得陈三立赋诗宽慰“指点新亭橘柚黄,莫衔杯酒话潇湘”<sup>[28](39)</sup>。古之潇湘与外部世界相隔阂的地理形象,正是在这样的书写中不断被确认和定格的。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学说思想在其死后两

百年被众多湘军将领推崇，他们对船山的服膺很难像郭嵩焘一样，从中寻求到因时求变的理论资源。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浪潮中，湖南山岭阻隔、地处偏僻的环境不再是审美化“潇湘”意象的外在支撑，却渐渐演变为内陆之省封闭性、保守性形象的内在组成元素。如前文所述，这种不同于平原与沿海地区的地理特质，一度被转化为晚清湘军勇武铁血的精神形象。曾国藩本人就曾在奏折中表现出对湖南旷悍偏僻之山民的偏好，只是这一源自地缘身份认同的荣耀并未持续多久。在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特别是在曾国藩亲手解散湘军之后，湘军对于本地社会及湖南形象的影响日益趋向颓势。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左宗棠旧部、邵阳人魏光焘率领的威武军一度被寄予力挽狂澜的希望，在辽东半岛的牛庄与日本军队激战，老湘军的骁勇终究未能抵过近代化日军的进攻，几乎全军覆没，此一战也被视为是湘军历史的终结。军事实力的日益落后是一方面，守旧不化、涣散腐败则是湘军堕落的另一方面。旧式军队不可避免的乡党习气和依附关系，让湘军群体及其背后的湖南绅民，从偶像变为被批判的对象。谭嗣同在自己的《仁学》中，将矛头对准了“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却“眈然骄居”“自屠割其民”的湘军，并将湖南人守旧不化的现实归因于湘军：

苟非牛庄一溃，中国之昏梦，将终天地无少苏。夫西人之入中国，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骇诧以为奇，独湘军既兴，天地始从而痛绝之；故湘人守旧不化，中外仇视，交涉愈益棘手，动召奇祸。又法令久不变，至今为梗，亦湘军之由也。<sup>[9](345)</sup>

在晚清小说家李伯元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就多次出现了贪污腐化、滥用刑罚的湘绅及湘军形象：第二十回中浮报开销、乱吃空饷的胡统领，第二十八回中纵兵为匪、乱剿良民的舒军门，等等。他们都被李伯元冠以了湖南人的身份。第三十二回中的毛长胜，“虽然是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却显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情”，俨然另一类中下层湘军的代表，他是“湖

南人氏。从前打‘长毛’，身当前敌，克复城池”，而今“一旦裁撤归农，无家可归”<sup>[29](338)</sup>，只能无所事事，坐吃山空。在李伯元另一本表现清末中国社会现实的谴责小说《文明小史》中，前十二回以湖南永顺地区发生的“排洋事件”作为整部小说的开篇，与书中的沿海开放区域形成巨大的反差。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李伯元对于湖南的保守和湘军湘绅的堕落有着特别的关注，但他对于湖南却并非一味地贬损。《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九回中，出现了一位整日满腹牢骚、打牌狎妓的湖南籍官员余道台，曾经也是读过新书、善谈时务的新派士绅，起先讲的也是“如何变法，如何改良”“说话之间总带着些维新习气”<sup>[29](328)</sup>，只因清高自许不愿上下打点，无从施展抱负遭人排挤，才逐渐丧失心气。虽是文学虚构，这个人物形象却体现了晚清湖南人物形象的内在张力。李伯元在小说的第五十六回，专门讲到发生在湖南的维新运动，在全书中罕见地不置褒贬，而称“开者自开，闭者自闭”，正与当时外界有关湖南“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sup>[23](130)</sup>的评价相契合。

作为不同于中原、沿海地区的形象，潇湘地理缥缈的“情”与“景”，到了晚清时期，一变而为湖南人物独立的“气”与“节”。此“气”与“节”虽有蛮荒不开化之象，在某些人士看来却是整个国家的开拓革新之机。陈宝箴在奏请开办湖南时务学堂的奏折中，夸赞湖南“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愷，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sup>[30](4)</sup>。其中“士节之盛”一句，道出了湖南士绅人物在混沌时局中的孤傲心气与不合时宜。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亦曾解释这一现象，“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sup>[31](1)</sup>。此见解与郭嵩焘在《船山王先生祠碑记》中对王夫之“伏处穷山，无友朋之讨论，无门弟子之推崇，潜德暗行，慨然以斯道自任，无所求知于人”的精神概括相趋近。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危机加重，康有为曾考虑倘若“中国割尽，尚留湖南一片，以为黄种之

苗”，理由正是“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他的弟子梁启超离开上海，去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教习，在给《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信中同样称许湖南之“人气”：

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sup>[32](1834)</sup>

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大力推行新政，开设矿务局、铸币局、轮船及机器制造公司，并在按察使黄遵宪与学政江标、徐仁铸的协助下，先后创立南学会、时务学堂，刊行《湘学报》《湘报》。湖南的维新一时间为世人瞩目，甚至英国的《泰晤士报》也注意到“中国最守旧之省”的转变，“长沙人民，素多诋毁洋人之议，毋怪其然，近来风气渐开，电报居然立局，电灯亦稍见于长沙，复有时务学堂，专议洋务，及西国有用之学”<sup>[33](9)</sup>。在梁启超日后写成的《戊戌政变记》中，这一系列维新举措的实施，描绘了湖南新政后“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sup>[23](143)</sup>。这一判断显然出自政治宣传鼓动的期望，而偏离了远为复杂的现实。与如火如荼的维新运动相较，来自湖南内部守旧群体的反对声音同样巨大。在1898年《湘报》第57号上，刊出一篇题为《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的文章，文中称“今南学会开矣，《湘报》馆设矣，时务学堂尤大有规模矣，省垣及各府州县书院亦渐讲变通矣，制造则有公司，矿产亦将开采，举积不能行之电线而行之弗阻，创屡不可通之轮船而通之弗远”，但这些新事物的兴起，却难掩“湖南目下风气之固陋”，地方发布“保护洋人告示，而痞徒居然挖补，谓有能杀一洋人而赏银二百元”，乡里细民“乍见新政，即传为洋人来当努力击之，语以化学电学光学之诸端，掩耳疾走，俨尘垢之污”<sup>[34](225)</sup>。从这篇文章的描述来看，晚清湖南形象中保守与维新的矛盾依然存在。

只不过，与郭嵩焘时代外界普遍关注湖南本土保守势力、并将之作为清帝国闭塞落后的典型相比，此时以主张维新变革的士人群体为代表，

则更看重且期待那些尝试走出潇湘的少数反叛者。在他们看来，这些湖南人在帝国“最守旧之省”的突围形象，蕴含了更多中国走向变革与开放的希望。戊戌变法及湖南当地的新政迅速夭折，以叶德辉为代表的湖南保守派士绅又卷土重来，但这场维新运动留给晚清湖南的精神遗产，以及对于世人心目中湖南形象的重塑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谭嗣同为中国变法慷慨就义的事迹，在文章史传、诗词小说中被不断演绎为民族变革力量的英雄形象，成为晚清湖南形象转变的又一重要节点。而包括唐才常、林圭、蔡锷、范源濂、方鼎英、杨树达等在内的一批未来湖湘精英，则正是从时务学堂开始，体验到与外部文明浪潮的碰撞。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曾作分析国民性问题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依然不忘这种闭塞风气与独立意志共存的湖南形象，并称：“吾尝在湖南，见其少年子弟，口尚乳臭，目不识蟹文，未尝一读欧西之书，而其言论思想，新异卓拔，洞深透辟，与西人学理暗合，往往而有。”<sup>[24](52)</sup>正是从湖南人这种较少历史负累、文化独立根性的“士节”“民气”上，梁启超们看到了中国变革的可能。

在梁启超把国家之革新、民性之改造寄托于湖南的同时，大批湖南学子从“潇湘”走出去，东渡日本，并通过湖南编译社等社团和《游学译编》《洞庭波》等刊物，表达了强烈的本土身份意识和群体责任认同。从他们身上，可以明显感受到重塑“湖南”及以新“湖南”创新“中国”的尝试和努力。由黄兴、杨毓麟、杨度等留日湘籍学生共同创办的《游学译编》，第3期便刊出《致湖南青年劝游学外洋书》一文，鼓励湖湘青年外出游学；陈家鼎在《洞庭波》上撰《二十世纪之湖南》，批评湖南人“保皇性之愚谬”“守旧之性固结”“排外性之误看”之病症；陈天华作《敬告湖南人》，则将湖南人铁血的牺牲精神与民族主义革命的思想联系起来；而杨度在他著名的《湖南少年歌》中，首先回顾了连山叠翠、江水清浅的古典“潇湘”，进而联想到无军舰、无民主的现实“湖南”：

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

云一片青，衡山积雪终年白。沅湘两水清且浅，林花夹岸滩声激。洞庭浩渺通长江，春来水涨连天碧。天生水战昆明沼，惜无军舰相冲击。北渚伤心二女啼，湖边斑竹泪痕滋。不悲当日苍梧死，为哭将来民主稀。<sup>[35](191)</sup>

读者通常铭记的是杨度在诗中喊出的惊世之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以及他对“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的期望。但诗歌的开头一段，无疑更能代表晚清湖南人对于“潇湘”形象的回望凝视和改造更新，杨度上溯了从《尚书》《山海经》就已开启的“沅湘”“苍梧”形象，并大胆地指出了其存在的现实缺陷。与之相对，杨毓麟的《新湖南》则从这种缺陷中看到转机，称湖南虽保守，却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奴性亦未甚深固，其因在于潇湘地理之偏远，“盖所受于地理使然，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sup>[36](65)</sup>。他在文末作《湖南独立歌》，想象出一副崭新的潇湘图景：衡山之高高极天，“西瞰峨眉太白”“南望越南之大海”；湘江之水流若驶，“一日下城陵矶，三日而出太平洋”<sup>[36](32)</sup>。这种尝试在全球文明图景下重新定义的湖南形象，又成为更多湖南人由保守走向开新的现实驱动力。与二杨著作同时期的两部小说文本，恰恰印证了湖南形象外部转捩点的开启：吴趼人的小说《上海游踪录》里，儒生辜望延在目睹军队在湖南本地村落的骚扰洗劫后，愤慨失望而逃往上海(吴趼人原本计划写主人公去了日本)；而在署名作者为“荒江钓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原创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湖南人龙孟华被本地官府缉拿，最终在友人帮助下逃离家乡，搭乘军舰登上了月球。从湖南到上海，再到日本甚至更加幽远浩瀚的星球，在这些外部视野中，湖湘人物从古典潇湘风景中走出，迈向现实世界和未来宇宙，为晚清湖南形象以及自身文化的更新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和张力。

#### 四、结语

法国形象学家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曾论述

作为注视者的“我”与被注视的形象“他者”之间的关系，称“形象是一个封闭的、强制的符号体系内的符号，这一体系支配了对于他者可能的梦想，并要求选择立场”<sup>[37](210)</sup>。一方面，对于处在近代中国全新符号体系下的湖南形象而言，潇湘意象在外部视角和本土书写中的逐步衰落，意味着原有符号体系的解体，以及背后促发其解体的社会和文化革新；而外来视角、文明观念，以及全新的知识体系主导的书写规则，则缓慢地改变着老大帝国形象的自我认知，也促使湖南形象及其实体构成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型。另一方面，潇湘意象及其代表的湖湘地理文化，经过危机中的批判、改写和再阐释，以新的形式及内容参与了晚清湖南形象的重塑，从地理自然形象脱胎而来的独立文化根性，被构建为国家、国民改造更新的期望。无论是外省同胞“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sup>[20](66)</sup>的期许，还是本土青年“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sup>[38](18)</sup>的使命感认，新的湖南形象书写，实质上亦对湖南及湖南人本身不断起了作用，促使他们以更加开放进取的姿态，跃出了固有静态审美的形象范畴，进入近代中国沧桑剧变的历史时空，并通过对于这种自我形象的认同和趋近，承担起更多关于国家民族文化更新的探索与实践。

#### 注释：

- ① 关于晚清湖南及其形象的研究中，涉及湖湘文化、湖湘人物的居多，其中兼及对于湖南形象的探析。如林增平从移民的繁衍教化、劲直尚气的民风 and 船山学说的传播等几个角度，探讨近代湖湘文化的形成，参见：《近代湖湘文化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方克立则从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湘学传统本身，分析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崛起，参见：“湘学精神”与“湖南人精神”，《文史哲》2005年第1期。此外，欧人、杨沛瑾的《湖南人历史形象述论》(《船山学刊》2004年第1期)、王继平的《论近代以来湖南与湖南人形象的构建》(《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则开始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注意到湖南作为特定形象的建构问题。
- ② 关于“潇湘”意象的历史衍变，参见：王晓明。《中国

古典文学史上潇湘意象群之建构与拓展》,《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另杨雨《唐宋名士潇湘情》(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黄仁生、罗建伦《唐宋人寓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版)中,收录有唐宋时期柳宗元、杜牧、辛弃疾、李商隐等旅湘名士关于潇湘的诗文作品。

- ③ 在原著当中,作者使用的是“letters”(文学作品)一词,原文为 Hunan has a high position for letters. 参见: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3, 148.
- ④ 有关王梦湘的生平,参见:严薇青.《〈清诗人王梦湘墓志铭〉笺注——关于〈老残游记〉中的“梦湘先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第29-35页。

### 参考文献:

- [1] 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M].常绍民,明毅,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DAWSON R.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M]. Trans. CHANG Shaoming, MING Yi. Beijing: Shishi press, 1999.
- [2] 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YUAN Ke. Shanhaijing notes[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0.
- [3]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校注[M].朱惠荣,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XU Hongzu. Travels of Xu Xiake notes[M]. ZHU Huirong.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 [4] 米芾.潇湘八景并序[C]//湖南纪胜诗选.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MI Fu. The eight sceneries of Xiaoxiang[C]// Selected poems of Hunan. Changsh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2.
- [5] 卫三畏.中国总论[M].陈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WILLIAMS S W. The Middle Kingdom[M]. Trans. CHEN J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6] 爱德华·胡美.道一风同[M].杜丽红,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  
HUME E.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M]. Trans. DU Lih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 [7] REV G JONH. The situation in Hunan[J]. The Chinese Recorder, 1897(6): 255.
- [8] 柏生士.西山落日:一位美国工程师在晚清帝国勘测铁路见闻录[M].余静娴,译.李国庆,校.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PARSONS WM. BARCLAY. An American engineer in China[M]. Trans. YU Jingxian.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Press, 2011.
- [9]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TAN Sito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Tan Sitong[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 [10] 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八册[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LIN Zexu.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n Zexu: Vol 8[M]. Fuzhou: Strait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 [11] 秋瑾.秋瑾集 徐自华集[M].郭延礼,郭蓁,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  
QIUJ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Qiuji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
- [12]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下[M].钱仲联,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HUANG Zunxian. Annotation to the Huang Zunxian's poems[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1.
- [13]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J].湖南历史资料,1959(1): 105.  
PI Xirui. Shi Futang Unpublished Diary[J]. Hunan Historical Information, 1959(1): 105.
- [14] 商衍鎰.清代科举考试述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  
SHANG Yanliu.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M]. Taipei: Wenhai Press, 1975.
- [15]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M].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1.  
ZHANG Pengyuan. Regional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ization Hunan province(1860—1916)[M].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1981.
- [16]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二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GUO Songtao. Guo Songtao's Diary: Vol II[M].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 [17] 曾国藩.湖南文征序[C]//湖南文征.长沙:岳麓书社,

2008.  
ZENG Guofan. Preface of Hunan Wenzheng[C]// Hunan Wenzheng. 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
- [18] 续修四库全书·六六一·史部·地理类[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Editorial board of "Continuation of Siku Quanshu". Continuation of Siku Quanshu[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19] C.W. Allan. Our entry into Hunan[M]. London: Robert Culley, 1905.
- [20]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LIANG Qichao. Collected Works of Yinbingshi·Corpus I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 [21] 裴士锋.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M]. 黄中宪, 译. 谭伯牛, 校.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STEPHEN R. Platt.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M]. Trans. HUANG Zhongxia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5.
- [22] 陈三立. 散原精舍诗文集: 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CHEN Sanli. Sanyuan Jingshe Poetry Collection[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23]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LIANG Qichao. Collected works of Yinbingshi·Feature 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 [24]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LIANG Qichao. Collected works of Yinbingshi • Corpus II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 [25] 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 第三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GUO Songtao. Guo Songtao's diary: Vol 3[M].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 [26] 谭其骧. 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J]. 史学年报, 1932(4): 47-107.  
TAN Qixiang. History of mainland China immigration • Hunan[J]. Annual Report of History, 1932(4): 47-107.
- [27] 王夫之. 潇湘怨词[M]. 同治四年湘乡曾氏金陵节署刻本, 1865.  
WANG Fuzhi. Xiaoxiang Yuanci[M]. Tongzhi four years Edition, 1865.
- [28] 陈三立. 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M]. 潘益民, 李开军, 辑注.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CHEN Sanli. Supplement of Sanyuan Jingshe Poetry Collection[M].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29] 李伯元. 官场现形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LI Boyuan. The records of officialdom exposure[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30] 陈宝箴. 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设时务武备学堂折[J]. 湘报类纂, 1911(戊上): 4.  
CHEN Baozhen. Set up a school affairs book[J]. Xiangbao leizuan, 1911: 4.
- [31] 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QIAN Jibo. Hunan style of stud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2] 汪康年. 汪康年师友书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WANG Kangnian. Collected letters of Wang Kangnian[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33] 英国《泰晤士报》论中国时下情形[J]. 曾广荃, 译. 时务报, 1898(55): 8-10.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J]. Trans. ZHENG Guangquan. The Chinese Progress, 1898(55): 8-10.
- [34] 张云翼. 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J]. 湘报, 1898(57): 225.  
ZHANG Yunyi. On Hunan's atmosphere has not entered civilization[J]. Xiang Bao, 1898(57): 225.
- [35] 杨度. 湖南少年歌[J]. 新民丛报, 1903(42, 43): 191-195.  
YANG Du. Hunan youth song[J]. Xinmin Congbao, 1903(42, 43): 191-195.
- [36] 杨毓麟. 杨毓麟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YANG Yul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Yang Yulin[M]. 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
- [37]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形象学研究: 从文学史到诗学[C]// 比较文学形象学. 蒯轶萍,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PAGEAUX Daniel-Henri. Imageology research: From literary history to poetics[C]// The Imag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 KUAI Yip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CAI 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aie[M]. Changsha:

[38] 蔡锷. 蔡锷集[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The decaying of Xiaoxia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nan ima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Ch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 of Hun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underwent a process from crisis to transformation in various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texts. The highly aesthetic Xiaoxiang image in the ancient times gradually decayed and mutated. Under the impact of foreign civilizations, Hunan became the most conservative Chinese region in the eyes of foreigners. In response, the founders of the Hunan Army, such as Guo Songtao and Zeng Guofan, began to walk out of Xiaoxiang scenery to seek a way out for both themselves and the country. Along with the local gentry, they presented a multi-dimensional image of Hunanese of being both conservative and aggressive. Although the Reform Movement in Hunan during the 1898 Movement finally failed, the scholars with Liang Qichao as the representative, unearthed the “Shijie” and “Minqi” of Hunan Province from the wild and remote Xiaoxiang geography as well as cultural reality, which shouldered less historical burdens but more independent roots. And on this basi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Yang Du, Yang Yulin, and other Hunan students in Japan, completed the imag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Hunan ima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Xiaoxiang; Hunan image; missionary; Hunan army; Reform Movement

[编辑: 胡兴华]